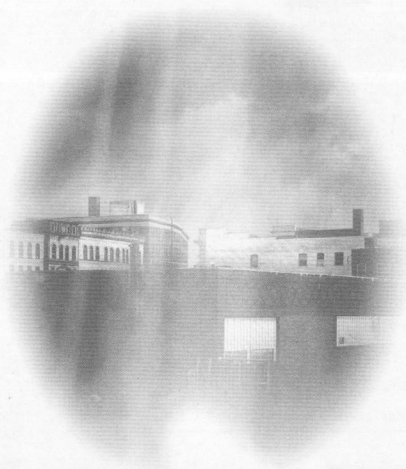




追寻克林索尔

EN BUSCA
DE KLINGSOR

[墨西哥]博尔皮 著 王莹 宋尽冬 译
译林出版社



追寻克林索尔

[墨西哥]博尔皮 著 王莹 宋尽冬 译

EN BUSCA DE KLINGSO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克林索尔 / (墨) 博尔皮 (Volpi, J.) 著; 王莹, 宋尽冬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10
(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En busca de Klingsor
ISBN 7-80657-811-0

I. 追... II. ①博... ②王... ③宋... III. 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IV. 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949 号

EN BUSCA DE KLINGSOR by Jorge Volpi
Copyright © 1999 by Jorge Volpi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 2004 by Yili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rdigo Kerrigan Asociados Sl.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in conjunc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0-043号

书 名	追寻克林索尔
作 者	[墨西哥]豪尔赫·博尔皮
译 者	王 莹 宋尽冬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Seix Barral Biblioteca Breve,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
插 页	4
字 数	352 千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811-0/1·590
定 价	(精装本)25.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豪尔赫·博尔皮于1968年出生于墨西哥城。他先在墨西哥自治大学学习法律，后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不是昙花一现的，他反对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刻意模仿。对他来说，文学是寻找之路，是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秘不可知的部分。他自2001年起担任墨西哥驻巴黎文化中心主任。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散文《想像与政权，1968年知识分子的故事》(1998)和小说《黑暗的沉默》(1992)、《愤怒的日子》(1994)、《墓地的安宁》(1995)、《忧郁的性格》(1996)、《治愈你痛苦的肌肤》(1997)、《世界末日的游戏》(2001)和《疯狂的终结》(2002)。

《忧郁的性格》是他的成名作。讲述了一个住在墨西哥的德国电影导演当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后决定拍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他召集的九个没有经验的演员，其实是被他有意选定的。这个故事犹如宇宙的缩影，在最后审判前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起，进行评判。

2002年他又发表新作《疯狂的终结》。这是一部对拉丁美洲革命左派在二十世纪下半期所犯的重大错误的批评与讽刺的小说。也就是说，作者力图重现当时左派的活动：自1968年墨西哥、法国镇压学生运动的历史时刻开始，左派试图采取武装革命的道路来改变社会，从而导致了恐怖主义的产生、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不仅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加重了社会危机，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安。小说揭露了激进组织（不仅是拉美的，也包括法国的）的错

误,论及了古巴革命和智利的民选政府,最后还剖析了八十年代的墨西哥。《疯狂的终结》是作者准备写的有关二十世纪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追寻克林索尔》。虽然两部之间的人物与故事完全不同,但都是采用虚构与现实,真实的人物与虚构的人物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思考。

199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追寻克林索尔》获得了当年的西班牙布雷维图书馆奖。克林索尔是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中的人物。剧情取自中世纪的宗教故事。圣杯与圣矛的护卫统领安福尔塔斯受女巫的蛊惑而犯戒律。女巫则受妖术士克林索尔的引诱,倾向邪恶,帮助妖术士窃得圣矛,刺伤安福尔塔斯。此伤百药难治,只有天下之大愚收回圣矛,才能治愈。山村少年帕西法尔愚蠢之至,竟闯入妖术士园中,他不为女巫的诱惑所动,取得圣矛。数年后,青年用圣矛治愈安福尔塔斯的创伤。人们拥戴帕西法尔为新统领。博尔皮正是以这个故事为背景,对第二次大战中的科学、纳粹、权力和罪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小说情节紧凑,酷似一部侦探小说,但它却以哲学思辨的力量给读者的心灵以很强的震撼。

这部小说的叙事方法比较奇特。它的名义上的作者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数学教授古斯塔夫·林克斯。1989年11月,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前不久,林克斯在当时属于民主德国的莱比锡的一家疯人院里开始写他的这部回忆录。他的回忆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讲述的是自己的一生,讲述他的出生、受教育、婚姻家庭、工作、交往等方面情况,展开的是基本上纵向的画面。另一部分讲述的是培根中尉的故事和他与林克斯在1947年合作寻找克林索尔的工作,展开的是基本上横向的画面。这两部分回忆交叉进行,到小说即将结束时,这两部分的回忆会合到一起。

这位林克斯教授出生于1905年,他经历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战败后的社会动荡,以及纳粹势力的兴起和掌握国家政权。他曾是著名物理学家魏尔纳·海森伯的工作伙伴,他的朋友

海因里希·冯·吕茨因为参加了以施陶芬伯格上校等人为首的7月20日政变而被杀害,受到这种朋友关系的牵连,并且自己也为政变做了些外围的工作,林克斯也被逮捕。正当他在“人民法庭”接受审判并注定要被判处死刑时,盟军的炸弹摧毁了法庭大楼,落下的大石块将审判长弗莱斯勒砸死,审判中断,并由于各种原因而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最后他被美军解救。

曾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的美军中尉弗朗西斯·培根(与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同名同姓)受命来到德国,执行阿尔索斯计划,逮捕参加纳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并了解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科学研究特别是原子弹研究工作的状况。在翻阅纽伦堡审判的记录时,他发现一个神秘的代号,克林索尔。从材料分析,这是希特勒的一位高级科学顾问,他负责审核纳粹德国重要的科学研究计划的立项与拨款。培根决心要找出这个神秘的克林索尔,他向他的导师约翰·冯·诺伊曼教授求助,冯·诺伊曼教授向他推荐了古斯塔夫·林克斯,因为林克斯既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培根中尉来到德国新的科学中心哥廷根,找到了林克斯,他们开始合力找寻克林索尔。

在追寻克林索尔的工作中,培根中尉和林克斯教授带领着我们认识了普朗克、冯·劳厄、海森伯、玻尔、斯塔克、薛定谔等当时尚在人世的著名科学家,了解了二十世纪初德国科学发展的动态,因而也就了解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动态,因为当时德国的科学研究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科学史的回顾使我们深切地感到,一旦科学与恶结合在一起,它就不再是单纯无辜的了,它将给人类带来极为可怕的灾难。通过了解当时德国的科学发展动态和科学家们的生平经历,我们实际上了解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历史,认识到了当时德国民众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而这一切,正是林克斯讲述的故事所发生的背景。培根中尉和林克斯教授等虚构人物的虚构故事混入了由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科学史、科

学原理构成的背景中,使我们信以为真,急于要知道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跟着培根中尉和林克斯教授一步一步地接近了神秘的克林索尔。但最后,究竟克林索尔是谁,小说留给我们的答案并不是明确的,尽管它给我们作了提示。

故事的结局似乎有点出人意料,但如果我们联系培根中尉的成长经历来看,这个结局则是他性格中固有的弱点自然而然导致的。林克斯所遭到的背叛在他自己看来,则仿佛是他曾经犯下的背叛的报复,这个背叛又正是两部分回忆的交会点。至于培根中尉,虽然小说在最后并没有追踪报道他的经历,但我们可以推断,等待着他的也同样是一场悲剧。

在故事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也像书中的两个主人公一样,急于要知道这个神秘的克林索尔究竟是谁,但小说结束时,克林索尔并没有找到,我们却没有感到缺憾,因为我们在阅读过程中,真正关心的是故事中的各个人物的命运。

布雷维图书馆奖评委之一、1997年塞万提斯奖获得者、古巴作家基列尔莫·卡夫雷拉·英芳特评论道:“《追寻克林索尔》是这样一种艺术的杰出典范,我想称这种艺术为科学小说。这是一种以历史、政治和文学相伴随的科学小说,为的是证实我们所称的文化。这是一部用西班牙文写成的德国小说。博尔皮在创造人物方面颇有造诣,这些人物有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另一些则是虚构的。而所有这一切都由扣人心弦的情节这种为电影和许多小说与戏剧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的聚合力联合在一起。这会令我们好奇,使我们急于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是杰出的。”

这部小说的译笔流畅,比较忠实地反映了原著的风貌。这是两位译者辛勤劳动的成果。

景昭 2004年9月于南京

谨献给阿德里安、埃洛伊、赫拉尔多、纳丘、佩德罗·安赫尔以及其他政变参与者。

序 幕

“够亮了!”

他苍老生硬的叫嚷让这个世界转眼间回到了那个阴冷黑暗的年代。四周漆黑如墨,死一般的静寂把这片黑暗渲染得更为凝重。短短数秒之间,无人对他鼓掌喝彩,无人对他欺骗辱骂,就连时钟也听话似的默不作声。死亡肯定与此类似。只有当他听到自己的回声消失时,他才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并不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重新开始!”他命令道,“我要再看一次!”

放映员双手挪上放映机,卷绕拧合,转动曲柄把,机器开始艰难地运转起来。元首全神贯注地感受着机器不停地发出的喃喃细语。这是黑暗的末日,也是他怒火的尽头。一道强光扫过大厅,好似直穿敌人胸膛的子弹停驻在屏幕上。他隐约看到楼梯平台、窗帘的布褶子和扶手椅的侧影。同每个夜晚一样,放映厅又成了开火前线。

光线在房中杂乱地四处铺散,落上了墙壁、地毯,附上了他的唇、耳,弄乱了他的头发,最后慵懒地撒向各个角落,整个房间俨然一个仿制的虚幻世界。光亮与阴影在他面前共同庆祝着一场血淋淋的仪式,重复着一张张垂死挣扎的面孔,将那些早就已经不复存在的躯体永远地定格在他的眼前。如同孩童不厌其烦地倾听他最爱听的故事一般,希特勒不知有多少次这样饶有兴致地品味着这一幕画面。

因与果的交替触发了他的这种怪癖,根据来自前线的消息而

每次有所不同：一下鞭打，跟着是一声呻吟；一个伤口，跟着是一道血流；躺倒在地，跟着的是死亡……对他而言，这已成为日常习惯，每个午夜，他都会回味这幕场景，看着屏幕上他的对手们在受着惩罚，苟延残喘，与其说这是他病态的娱乐方式，不如说是一种独特的疗法。有时他也想，如果不事先服一点这味不伤人的视觉药剂，他会连觉也睡不着的。他记住了每一个画面、每一幕场景和每一组镜头。他像一个狂热追逐者期盼得到他所仰慕的明星的初吻那样，兴致十足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回味着。

“好极了！”看到第一个镜头，他便以恶魔般的嘴唇叫了起来。

就这样，他欣赏着这部自导自审的影片，每天同一时间看同一部片子，只有一位面色苍白的党卫队分队长陪着他。这位分队长荣幸地接受这一光荣任命，在这地下掩体中担任放映员。片中的处决场面和其中凝聚的史实赋予了这部艺术作品一种奇异的美，这是一幅比他少年时代画的任何一幅水彩风景画都要美的风景，这要归功于那些叛逆者的不忠和刽子手无可挑剔的忠诚。

“很好！”他又咆哮了一声，好像有架摄像机要把他的牙龈与齙齿永远定格下来一般。影片最后几幕飞快地进入他的瞳仁，那是曾遭受过酷刑的肢体残骸，几乎已经辨不出人形。在他惟一所认识的，仿佛很虚假的极度亢奋里，他又呻吟了一声：“好极了！”

最后，放映员开了灯，照亮了整个放映大厅。他期待着看完了电影后元首紧张忧郁的情绪能得到缓解。然而希特勒却始终缄默不语，只是朝着空荡荡的屏幕，对周围炸弹的轰炸无动于衷，尽管这些炸弹每分钟都能摧毁柏林北部的几十座建筑。只有在这特殊的短短数秒之间，他才会暂时忘却自己的失败。

“再放一遍！”

荣耀已逝，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上街去接受民众的欢呼了，也几乎记不起他脚穿皮靴肆意践踏巴黎花园的那个美丽清晨。恰恰相反，如今的他必须把自己与一个未知的沉迷于电影的虚幻世界

的灵魂等同起来,与一个同无数因他的罪孽横尸欧洲大地的冤魂并无不同的灵魂等同起来。这部电影是他拥有一如既往的权力的惟一领域。灯光又灭了,那位有着炮兵的机敏的分队长扮演着灯光师的角色。当然,当灯光扫向屏幕时,元首正懒洋洋地坐在他的位子上。

1944年7月20日,一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德国国防军——也就是帝国的军队——军官,在数十人的协助下,策划于距柏林六百公里的腊斯登堡召开的一次军营会议上刺杀希特勒。曾在北非战事中落下残疾的年轻上校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伯格伯爵,在一只手提箱中塞入两颗炸弹,设法放在了希特勒的桌子底下,他们希望通过爆炸事件,发动政变,颠覆纳粹政府,这样或许还能尽早结束战争。

然而一个极小的误差——一个炸弹无法引爆,或许是箱子离希特勒太远了——,使得整个计划全盘落空。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也没有任何一位党或军队的高级官员受到重创。尽管初次图谋受挫,密谋者还是决定重振旗鼓、继续努力。然而事发翌日凌晨,纳粹就重新控制了局势。当晚,在柏林班德勒大街陆军总司令部,政变主要领导人路德维希·贝克、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魏尔纳·冯·哈夫登、阿尔布莱希特·里特·梅尔茨·冯·基尔恩海姆,和施陶芬伯格一起被处决,同时奉帝国元首及新上任的内务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之命,迅速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追踪调查。

令他们自己及外界都大为惊讶的是,这次政变牵涉极广,包括将军、上校、企业家、外交官员、海陆军情报部门特工、技术人员和商人。抱着顽固的劣质血统论,希姆莱不仅下令逮捕了政变的直接参与者,甚至连他们的家人也不放过。到1944年8月底,约有六百多人因支持政变者或与他们有关联而被捕。

狂怒的希特勒决定掀起一场针对反对派的惩戒性报复行动,此时恰逢德国濒临战败的边缘。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只不过才过

了几个星期,就有人想要他的命了,他的生死与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要像他的对头斯大林 1937 年在莫斯科发起一系列审判一样,也来一次大规模的审判,让世人看看那些被审判者的卑劣行径。希特勒在他的狼窝军营里召见了帝国人民法庭主席罗兰德·弗莱斯勒,甚至还召来了两个负责行刑的刽子手,向他们下了命令:“我要把他们全部绞死,剁成肉酱!”

审判于 8 月 7 日在柏林人民法庭大厅展开。有八位被告出庭,他们是: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埃里希·赫伯纳、赫尔穆特·斯蒂夫、保罗·冯·哈斯、罗伯特·贝尔纳第斯、弗里德里希·卡尔·克劳辛、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和阿尔布莱希特·冯·哈根。他们被禁止系上领带、背带,甚至连其辩护律师也主动要求宣判他们的当事人有罪。弗莱斯勒两旁各插有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听着被告们的抗议之声,他一遍又一遍地要求肃静。谁也不应该听到那些抗议言辞。他的恶意显而易见:毫不留情地宣判八位被告死刑。然后对他们说: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生活中去,回到战斗中去了。人民已经把你们这些人清除出了队伍,维护了它的纯洁。我们与你们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是在战斗。当国防军高呼‘救星,希特勒!’的时候我们也一同欢呼‘救星,希特勒!’。我们是在与元首并肩作战,追随他,为德意志的光荣而战!”

8 月 8 日,犯人们被押往普卢茨恩湖监狱的地下室。希特勒不允许他们得到丝毫的精神上的安慰:他不仅要给他们的肉体判刑,也不打算放过他们的灵魂。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换上统一的囚服和旧木屐。就这样,犯人一个接一个地穿过监狱的长廊,进入了一间门口垂着长长的黑布帘的行刑室。

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摄影师奉命跟踪拍摄这八位犯人。他拍下了他们更衣时裸露的身体;拍下了他们那或恐惧、或害怕、或庄严的表情;拍下了他们或骄傲或痛楚的眼神;拍下了两星期来严刑

拷打留在他们身上的累累伤痕；拍下了犯人们跌跌撞撞走过长廊的情形；也拍下了他们越过那块象征死亡界线的黑布、进入房间、上了绞刑架的情形。奉希特勒的命令，每个犯人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极其严密的监视之下。他当然不会给他们观看自己的绞刑的机会，而私底下，片子刚刚制作完毕，他就迫不及待地观摩一番。

舞台布置好了。第一个主角出现了——他笨手笨脚，面色煞白，头发凌乱，脚上拖了一双令人恶心的沾了粪便的木屐，大概是走过长廊时沾上的。这时，两个大功率的聚光灯骤然亮起。刹那之间，周围空气似又变得纯净，至少在光线的作用下看上去是这样。他的眼睛闪了闪，随即又熄灭在那强烈的、定要将他化为灰烬的灯光里。他的脸上带着羞愧的神色，那是一个人不得不对历史的注视时产生的愧色。还有一群显要陪他走过生命的最后时刻：总检察官、普卢茨恩湖监狱看守长、几位官员、摄影师和六个记者。

监狱长下达了命令，刽子手向他步步逼近。这时出现了一个半身镜头。刽子手带着一副冷酷无比的神情拉紧了绞索，他准备用这根由牢固琴弦制成的绳索绞死犯人。这时若有人出于增强戏剧效果的考虑，会建议导演^①把镜头推进行刑者那双布满老茧的生硬的手，亦或推近犯人嘴角处涔涔下落的汗滴，可此时此刻决不会出现另一个列尼·里芬斯塔尔^②，并具备与她相似的才能。此时，更应该让画面与那些广角镜头协调一致，与片中音效的乏味空洞、镜头的适度谨慎保持一致。刽子手解开犯人的双手，强迫他上了一个小平台，然后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个丝结，片刻之间，这个犯人仿佛成了一座溃败者雕像。这时，戏剧作品——噢，就是这部

① 原文为法文 *metteur en scene*。

② 德国女演员，1902 年生于柏林，1935 年起担任德意志第三帝国官方导演，影片有《意志的胜利》(1935)、《体育场之神》(1938)等。2004 年去世。

纪录片——终于迎来了它的冲突高潮。一秒钟死一般的沉寂，时间凝固了。所有在场者都绷紧了神经，一动不动，也没有丝毫的骚动不安，大家都在等待监狱长发出新的命令。

监狱长做了个几乎难以察觉的手势，示意绞刑开始。于是犯人的躯体开始移动起来，慢慢地，看上去像在跳芭蕾，缓缓地上移、悬起，悬在了半空。摄影机认真记录下他垂死挣扎的每一个细节，整个过程持续了几分钟之久：首先是主人公双眸中的深深恐惧，接着是脖子套索处已呈棕色的血肿，然后犯人大口喘着粗气，口吐白沫，口鼻渗血，最后是他剧烈抽搐的躯体。多逼真的演绎啊！让人想起垂钓老手钓起的硕大鲟鱼。他的身体吊在半空，摇来晃去，活像一把钟舌，不断地敲击着周围空气筑起的墙壁。

就其哗众取宠的目的而言，还缺点精湛独到的戏剧变奏：真正厉害的人不仅满足于打垮敌人，还要对他百般嘲弄，让世人知道，没有一个人能有足够的精神意志跟他对着干。监狱长挥了挥手，示意开始表演。刽子手狞笑着靠近尸体，猛地拉下他的裤子。摄影机镜头不怀好意地对准死者那短小的生殖器，让人们看看这帮违抗元首旨意的家伙是多么的虚弱无力。

看着画面上两条长长的、苍白的、蜷曲着的裸腿，再看看死者私处带着怯意的阴毛，希特勒疯狂地鼓起掌来，不知是第几次为这堪称最佳表现主义影片的创意叫好。然而，这才干掉第一个。不过，行刑的刽子手和在场的监狱官员们也该稍歇片刻了，此时镜头不失时机地转向一张桌子，上面放满了盛满白兰地的酒杯，他们正等着庆祝一番。这时，吊在空中的犯人尸体被放了下来，它将被带往一处安全地点火化，骨灰也会随即撒掉。太好了，还有七个等着上绞架呢！希特勒看了看表，心头一阵狂喜。

9月5日，有人找上门来时，我正在路德维希街的家中等候几星期前海森伯交给我的一些数学问题。自从7月20日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希特勒宣布政变已被镇压，而且上帝保佑了元首安然无

恙时,我就知道,我的好日子也不多了。随后,接二连三的坏消息越发让人不安:施陶芬伯格及其密友一个个地遭到枪决,人民法庭正着手准备审判,一系列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也接踵而至。

尽管我总疑心下一个被捕的就是我了,但我仍极力让自己保持平静。可当一听说海尼,就是海因里希·冯·吕茨,一位童年时代起就与我交情甚笃的好友,也被逮捕的消息之后,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我又能怎样呢?离开德国?躲起来?或者逃得远远的?要知道那时全国正处于战争最糟糕的时期:一切都绝无可能。我别无他法,最多也只能静候党卫队或者盖世太保派人闯进我的家门。正如我所料,没几天警察便来了,他们将我铐上,立即带到了普卢茨恩湖监狱。

弗莱斯勒宣判了无数的死刑,到了1945年2月3日,我也不得不站在了位于观景楼街的人民法庭的被告席上。这天共有五个被告接受审判。第一个出庭的是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他是一名律师兼预备役中尉,曾担任过反纳粹组织领导人之间的联络员。7月20日过后不久即遭逮捕,从那时起一直被关在达豪和弗罗森堡集中营。跟往常一样,弗莱斯勒打断了他的话,嘲弄起我们这些犯人来,他管我们叫猪、叛徒,并大声吼叫德意志必胜,只要清除了我们这些败类,1945年德国必胜无疑!

可是忽然之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若非我亲眼所见,我也会认为那纯属瞎编乱造,亦或一个骇世奇闻。只听到空袭警报开始狂鸣不已,顿时一道红光掠过,照亮了法庭大厅,一片静寂立刻转为一声长啸,震得法庭大楼摇摇欲坠。那些日子里,对柏林人来讲轰炸早成了家常便饭,因此我们努力保持平静等待一切过去,恢复正常。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这并非一次惯常的空袭,而是盟军自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狂轰滥炸。我们几乎还没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法庭的楼顶就已被击中了。一层厚厚的烟和灰像下雪一般在大厅里弥漫开来,墙上的石灰纷纷滑落,噼噼啪啪,听上去

似乎不是很响。大家都等着审判继续，或者宣布休庭，翌日再审。但当我们抬起头，向前看去时，只见法官座位台上落着一块沉重的断石，旁边躺着罗兰德·弗莱斯勒，他的头颅已被一分为二，血流满面，染红了那张正要给施拉布伦多夫下的死刑判决书。然而，除了他以外，居然没有一个人受伤。

法庭的卫兵跑上街去找医生，几分钟后他们带回了一位身着燕尾服的家伙，他刚刚路过法庭门口，逃过了那场劫难。医生靠近法官的尸体，表示无能为力：弗莱斯勒早就一命呜呼了。我们这些被告站在原位，面面相觑，那些卫兵忿恨地看着我们，却一筹莫展。接着大家听到医生铿锵有力的声音：“很抱歉，我决不会这么做，你们可以把我抓起来，但我不会签这张死亡证明……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后来我们才得知，医生名叫罗尔夫·施莱希尔，他的哥哥吕迪格尔在航空法学院任职，几星期前正是眼前这位法官判了他兄弟的死刑。

弗莱斯勒死后，审判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盟军的轰炸最终摧毁了整座柏林城。从1945年3月开始，我就辗转于不同的监狱之间，直到德国投降后，在一支美军小分队的解救下，我们终于重获自由。与大多数同伴和友人不同，我幸运地逃过一劫。

1944年7月20日下午的政变中，希特勒侥幸地得以毫发无损。倘若施陶芬伯格成功地引爆了第二颗炸弹，倘若那只手提箱离希特勒再近一点，倘若箱中炸弹能够连锁爆炸，倘若施陶芬伯格从一开始就确保靠希特勒尽可能近些……2月3日早晨的轰炸同样也没能伤及到我。假如我是在另一场合接受审判，假如当天轰炸碰巧不是那时开始，假如那块断石仅差分厘未砸中法官，假如弗莱斯勒事先弯下了腰或者躲到了安全地带……我也不知道这两件事有多少相关之处。可为何事隔多年，我仍执迷不悟地将这些事实上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联系起来？为什么我老是把它们想到一起去，好像它们只是同一意志行动的不同表现？为什么我不退一

步想,其实它们后面没有隐藏着任何东西,就像大千世界诸多奇事一样,背后也是空空如也?为什么我还一直固执己见,抱住命运、天意等念头紧紧不放?

或许是因为其他一些骇人听闻的偶发事件使我有感而发写下了这几页。如果说我敢于将表面上不相干的事情,比如希特勒侥幸逃过炸弹和我因祸得福这两桩事联系起来考虑,那是因为实际上人类从未像现今这样如此熟悉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与以往不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不可抗力受制于这些偶然发生的细枝末节,受制于这个难以统治的混乱王国千变万化的种种表象。所以我很想讲讲这个世纪里错综复杂的种种联系,谈谈我所处的这个世纪各种各样的联系。我要让大家看看偶然性是怎样统治着这个世界的,看看在它的疯狂面前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的人曾是怎样的无可奈何。同时,我的讲述也会涉及一些不同的生命:首先是那折磨了我八十余年的生命,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然我要特别提及那些也是由于造化捉弄才与我有所交会的生命。有时,我乐于把自己想成一根导线,将那些故事一一串连起来,我的存在,我的回忆——也就是那些线索,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它使一个广博复杂的理论时时探出头来,帮助人们看清围绕在我身边的种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我的打算看上去太野心勃勃,太鲁莽,甚至于像是痴人说梦。这也无妨,当死亡随时都会造访一个人时,当他已失去全部希望,只剩下通往终结之路时,也只有讲述这些事才能公正评判我的过去了。

莱比锡大学数学教授

古斯塔夫·林克斯

1989年11月10日